

王建龙 著

长治久安： 理念、制度及其推进

严复政治哲学研究

YAN FU'S

POLITICAL PHILOSOPHY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学术研究丛书

王建龙 著

长治久安： 理念、制度及其推进

严复政治哲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治久安:理念、制度及其推进:严复政治哲学研究/王建龙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254 - 9

I. ①长... II. ①王... III. ①严复(1853 ~ 1921)—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2984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孙 莺

封面设计 范昊如

长治久安:理念、制度及其推进

——严复政治哲学研究

王建龙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254 - 9/D · 1721

定价 24.00 元

自序

这个简短的序言由我自己来写最合适,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个序言告诉读者我写这本书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的大标题是“长治久安:理念、制度及其推进”,这个标题概括了我对严复政治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和着力点。严复一生的政治理想是寻求“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寻求这个答案的过程中,不断地推进自己的思路,从最初的救亡图存到后来的富国强兵,最后发展到寻求良治社会:既能使国家富强又能使国家长久保持富强。为此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能使国家富强的方案和能使国家长久保持富强的方案是一样的,那些只能保证国家富强却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案最终会使国家失去富强。因此,必须要用使国家长久保持富强的方案去实现国家的富强。为了这个原因,他被人嘲笑为迂腐,但是他始终坚持,因为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哲学理论的支持,同时这个观点也是他对现实困境反思后痛定思痛的结论。他的哲学理念是“变与不变的平衡理论”再加上“进化论”,这两个理论的共同点在于通过好的量变的积累达到好的质变,也就是用渐变论来实现稳定性的发展;而在现实中他看到了中国历史中的治乱交替,也看到了西方穷兵黩武的战争恶行,这些现实使他希望找到一个消除这些困境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今天的我们看严复,一方面应该感慨严复是那么的单纯,看不到现实政治势力并不想为良好治理的社会奋斗,而只是想获取现实的政治利益而已;另一方面我们则看到了严复是

那么地直接和犀利，他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更为长远的利益去设计人类的制度并且耐心地推进，任何社会都必然无法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严复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对西方政治理念的理解是非常准确和细腻的，他对它们的形成背景和发展逻辑都非常了解，因此他能够明确指出中国人对这些理念的理解是多么地想当然并存在诸多乖谬。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仍然无愧为我们追求和实践自由、民主与平等这样一些理念时的导师。

今日中国是一个值得我们对其抱有足够渴望的国家，因为它已经摆脱了严复们所担心的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还发展为一个极富希望的国度，这种希望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对其未来发展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持乐观态度，也因为如此，我们多么渴望我们亲爱的祖国能够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长远考虑，认真准备，为完成这一伟大功业做出我们的努力。

这本书的“结论(二)：对谈录之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部分的讨论就是我们进行这一努力的一些思考，虽然很不成熟，但是仍然特别希望读者朋友能专门看看这一部分内容，这既是我本人对严复政治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思考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对严复老先生纯朴的热情表达的一种无上的敬意。

目 录

自序 / 1

导言 / 1

第一章 追求“治道”——变“治乱兴衰”为“长治久安” / 6

第一节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 / 6

第二节 从寻求富强到追求“治道” / 15

第二章 近代西方观念的引入 / 25

第一节 对传统“治道”的反思:治道与变道的分裂 / 25

第二节 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的引入 / 34

一、自由意识的觉醒 / 36

二、“人人皆平等” / 40

三、从反君权到求民主 / 46

第三节 西方观念的双重紧张 / 50

一、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内在张力 / 50

二、对西方观念的误读和混用 / 59

第三章 分疏与重构——对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的有机统一 / 66

第一节 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重新分疏 / 66

一、从《论自由》到《群己权界论》 / 67

二、“庶建”民主和“贤政”民主 / 76

三、机会平等和“势均”观念 / 81

第二节 “治道”理念的有机统一:治道与变道的整合 / 87

一、以自由为中心的有机体 / 88

二、“治道”理念的道德特征 / 92

第四章 进化论的介入——治道与变道的进一步整合 / 99

第一节 进化的两个层面：前进性和循序性 / 99

第二节 “治道”及其理念的进化特征 / 109

第五章 落实和推进——变中求治与治变统一 / 119

第一节 “治道”理念的制度落实 / 119

一、体用之辩 / 120

二、与民力、民智和民德的提高相协调 / 124

三、且守且进：以君主立宪制度为范本 / 128

第二节 民力、民智和民德的提高 / 132

一、学术作风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 133

二、知识视阈的扩展 / 139

三、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辨析 / 144

四、传统伦理的新发掘 / 149

结论(一)：对严复政治哲学思想的评价 / 156

结论(二)：中国向何处去？ / 164

主要参考文献 / 189

附：严复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 195

后记 / 203

导 言

从理想的角度去设想,人类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个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命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一个各个阶级和睦相处、内部分工明确、秩序井然的人类社会;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也认为理想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和平与和谐的社会。在中国古代,老子所期望看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安静的没有任何纷争的社会;近代的康有为也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们应该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这些理想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是寻求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良好秩序的特征被理解为“不变”。所谓“不变”,一方面指人人安于各自所处的等级序列中,严格遵守礼仪制度,社会的实际秩序因为符合礼仪制度而表现出稳定的特征;另一方面,人们长期严格遵守礼仪制度意味着这种良好秩序状态可以得到长久的保持,这种长久保持实际上就意味着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不变状态。古代中国社会将这种以“不变”为特征的良好秩序作为理想的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被限制在一个井然有序、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框架中,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治道”。但是古代社会这种“不变”的“治道”在实践中却表现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社会常态,试图“不变”的结果并没有导向“不变”,反而使社会陷入怪圈。

但是知识视阈的局限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走出这种被固定化了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只是在清末中国社会遭

遇王朝衰落和外国入侵的双重危机的时候，对危机根源的思考才促使中国人开始彻底反思中国传统上对人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回答。人的生存状态应该被限制在一个井然有序、等级森严的秩序框架中吗？为什么这种生存状态无法在现实中成为一种永恒？是否有其他的生存状态？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才既能够符合人类的理想又能够转化为现实？当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进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时，新的答案就出现了。

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作为对西方社会有深刻了解的启蒙学者，严复显得相当突出。严复的思考具体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治道”的反思和对新“治道”的阐释。同其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样，严复的反思是从对民族生存危机的忧思开始的，“救亡图存”是严复开始反思的最初的也是直接的动因。但是，在如何实现救亡图存这一目标的思考中，严复的思考一步步被引向深入，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再到追求“治道”，严复在思考中一步步地质疑传统社会对“治道”的认识，最终做出了与传统社会的认识有本质区别的回答。

中国传统社会的“治道”把“不变”视为当然之则，其依据即在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认识。因而在“变”与“不变”的关系中，“不变”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变”则与“不变”严重分裂和对立，并且因此受到了贬抑和排斥。但也正是因为对“变”的排斥使“不变”失去了平衡状态。这种“不变”的失衡在秩序上则表现为秩序稳定的严重僵化，当秩序的稳定衍变为一种秩序的僵化时，这种秩序就无法再持续下去了，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治道”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对“变”的追求就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亡羊补牢式的政治策略，以“不变”为当然之则的传统“治道”被以“变”为当然之则的“变道”所直接取代。这种对“治道”的极端排斥和对“变道”的极力迎合并没有改变“变”与“不变”严重分裂和对立的状态，社会秩序由原有的凝固状态突变为秩序的消失，“变”由于排斥了“不变”同样失去了平衡，秩序稳定的局面被打破，社会失序，甚至出现混乱状态。

显然，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不变”，也不在于“变”，而在于“变”与“不变”的平衡。在实际的反思过程中，严复把“变”与“不变”的平衡作为一

个基本的原则,一方面通过“变”来保持“不变”,另一方面通过“不变”来限制“变”的异化,这种以“变”求稳、稳中求“变”的政治生存策略正反映了严复所认为的真正“治道”:一种在保持稳定秩序下的不断调整和发展进而在秩序和发展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的人的生存状态。

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的角度,“变”与“不变”的平衡表现为中国社会如何既能实现富强又能够保持富强这一问题的解决。实现富强意味着必须要“变”,而保持富强则内含着“不变”的原则,但是实现富强和保持富强的统一则要求“变”与“不变”的平衡。从求“变”的角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保持了相当高的热情,这种热情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在自由、民主和平等制度下体现出来的日新月异的富强局面正深合中国人求富求强的梦想,在这种热情的引导下,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被引入中国,作为中国社会实现富强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接受。

在对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的引入和宣传方面,严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自由、民主和平等之于富强的重要作用,严复也作了强力论证。但是,与其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在于,严复显然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解更为准确,也更为充分,他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积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也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内在张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种种误读和混淆的背景下,严复从追求“变”与“不变”的平衡的角度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含义进行了分疏和整合,试图对被误读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予以澄清,并通过这种澄清消解其内部张力,从而在分疏的基础上对三者进行新的整合,形成他所期望的“治道”理念,这三个“治道”理念既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能够保证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最终在“变”与“不变”之间实现平衡状态。

在严复看来,人的生存状态应该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状态。与传统社会中将人的生存状态凝固化的做法不同,在严复所指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状态中,一方面,人的生存状态体现为一种不断变动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变动人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从而使人的生

存状态呈现出积极向上的一面，由人组成的社会也因此得以维持和延续；另一方面，这种变动的过程又是一种呈现为平稳状态的变动过程，变动本身受到了自由、民主和平等制度所形成的外在的制度约束与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所包含的内在的道德约束。正是这种生存状态可以保证个人与社会各自展示自身而又并不互相妨碍对方，相反，二者在生存状态上显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和谐一致的关系。因而对这种生存状态的肯定，其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为个人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显示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它将为整个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群体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实现真正的“治道”奠定坚实的基础。

无论显示出多大的优越性，在近代中国，严复的“治道”本身无疑仍只是一个构想，尚未成为一个现实。而如何将构想付诸实施，使理想成为现实，对于严复而言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如何向“治道”推进的问题上，“变”与“不变”的平衡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在严复看来，传统社会向“治道”的推进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治道”，这显然是“变道”的逻辑延伸；同时严复指出，这种推进本身必须在确保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而这显然又与“治道”构成严格的逻辑关系，在“治”与“变”的统一中，稳步推进就成为推进“治道”的实际操作方法，这一方法很明显符合“变与不变的平衡”这一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引下，进化论介入严复的“治道”理想，“治道”的理念，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推进与确立也受到了进化论思想的规范和制约，作为一个具有强势地位的外部理论，严复借助进化论强化了“变”与“不变”的平衡这一“治道”推进的原则。

尽管这种方法对“治道”的推进可能有效，但是在如何使中国社会迅速摆脱困境、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上却并非捷径，对于这一点，严复显然有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尽管这一途径表面上看起来是迂途，但是中国社会要实现“治道”梦想，真正摆脱危亡困境，却只此一途，别无选择。在这种认识下，严复坚定而又艰难的坚守着他的理念，反对在民力、民智、民德低下、“治道”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尚未得到正确理解的情形下贸然构建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制度形式，在他看来，单纯的制

度形式并不能使社会真正进入“治道”，相反由于这一措施违背了“变”与“不变”的平衡原则，必然招致失败。很显然，在严复看似保守和迂腐的背后，潜藏着严复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性认识和对“治道”实现的执著追求。

第一章

追求“治道”—— 变“治乱兴衰”为“长治久安”

清末中国社会遭遇王朝衰落和外国入侵的双重危机,从民族命运的角度看,后者显得更为紧迫,也更为危急。传统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外族入侵都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的入侵,因而从文化血脉的传承来看,外族入侵并没有伤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命脉,但是清末社会所遭遇的外族入侵则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强势文化的入侵。因而,这一次外国入侵的危机关系着中国文化血脉的存亡,其严重性前所未有。“救亡图存”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一个迫切要求。救亡图存的具体方案的设计需要对危机本身的根源进行追究,这种根源是外国入侵抑或王朝衰落?更进一步说,危机是外国入侵势力的野蛮性的强大还是文明性的强大造成的?而王朝衰落是作为政治势力的王朝的衰落还是作为王朝存在背景的文化的衰落?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中的一员,严复思考的起点也是这一双重危机局面,而他最初的要求同样是救亡图存,但是,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把他引向更为宽广更为深入的领域。

第一节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

鸦片战争使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社会中典型

的王朝兴替,更重要的是整个民族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在此前曾经出现过,南北朝时期的拓跋族、宋朝末年的蒙古族和明朝末年的女真族的入侵表现为政治军事上的入侵,佛教的入侵则是典型的文化入侵。但是面对这些入侵,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入侵都被中国化了,政治军事的入侵异化为王朝的兴替,文化的入侵被纳入到传统文化的演进当中。^①因而,当新的危机出现时,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仍然以天朝大国的心态自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次的危机仍然可以得到化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仍然可以无须多作改变即可渡过危机。

这种认识更深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的华夷之辨。古代中国自先秦起就一直突出强调华夷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和四海的核心,华夏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孟子则称楚国为“南蛮鴟舌之人,不闻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豪感同对外部文化的极度鄙视密切地联系起来,使这种自豪感变成了一种盲目自大和极度排外的心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描述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②

在这种心理之下,面对外族的入侵,中国人的直接反应是对外族的极度仇视和鄙视相结合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认为外族的入侵是危机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危机的次要原因则被归结为当政者的腐败无能;另

① 冯友兰指出:“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中国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在政治上统治中国,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而蒙古人和满人并未使之明显中断或改变。所以在传统上,中国人认为,元代和清朝,只不过是中國历史上前后相继的许多朝代之中的两个朝代而已。”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②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转引自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一方面他们认为外族的入侵是一种野蛮的入侵，这种入侵必将被打败或者将入侵异化而纳入中国一贯的王朝兴替的历史中，入侵并不会伤及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相反，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将改造这些入侵者。

但是，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的震动比以往任何一次外族入侵都要强烈。这次战争的严重性表现在这次的入侵者在实力上特别强大，而且其所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所显示出的强势地位同以往的外来文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将这种势力和其所代表的文化像以往那样纳入自己的演进过程中，这显示出新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危机，更是一个民族的危机和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结局不是以往那种以一个王朝的覆灭为代价换取整个民族和文化的保存，而出现了更为不幸的可能，即整个民族和文化都将被吞噬，整个民族将被奴役，而且入侵者的文化将覆盖传统文化。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为迫切的任务。从时间的纵向发展来看，这一任务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告结束；从范围的横向跨度来看，这一任务覆盖了整个中华民族各个阶级各个集团，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但是如何救亡图存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在传统认识的指导下，对于西方国家的侵略，中国人最先提出的救亡策略仍然是“尊王攘夷”。一方面，“攘夷”的救亡策略显示出中国人将外国侵略本身作为危机的根源，试图以一种简单的排拒方式来解决外国入侵所造成的危机。从对外国军事侵略的防守和抵抗到对外国文化的排拒进一步发展到对外国人的仇视，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攘夷”框架。同以往的“攘夷”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更加加重了他们对外族的仇视程度，“顽固派”作为“尊王攘夷”的救亡策略的官方代表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国固有的制度；而在民间，义和团斗争的核心目标即是“扶保中华，逐去外洋”。

另一方面，“尊王”的救亡策略显示出中国人仍然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抱有高度的忠诚感。“尊王”实际上就是维护固有的体制和文

化,“祖宗之制不可变”的强调充分显示出“尊王”策略的保守性质。鸦片战争所造成的亡国亡种的危机使中国人维护传统中国基本制度和文化的意愿更为强烈。

实际上,“攘夷”和“尊王”是一体之两面,“攘夷”是为了“尊王”,而“尊王”则强化了“攘夷”。对外族的仇视是出于其对本国传统的巨大威胁,仇视外族又反映了对本国传统的高度忠诚;而对本国传统的尊崇要求必须排拒外族的入侵,即这种尊崇强化了对外族的排拒。

“尊王攘夷”又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鸦片战争造成中国社会震动的最初阶段,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仍未感觉到这种危机同以往的危机存在着质的不同。在他们看来,危机的制造者西方侵略国家仍然是蛮夷之国,尽管在军事上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在文化上仍然处于落后地位。实际上,早在军事入侵之前的明代中后期,西方文化已经开始缓慢地渗透到中国传统知识的体系中。西方社会的天文学、几何学等科学在那时已开始传入中国,这些新知识被中国人称为“格致之学”,与格致之学同时传入中国社会的是大量的实物如眼镜、显微镜、钟表和各种科学仪器,这些实物和仪器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在很多人手里不过是掌上玩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利用”^①。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奇技淫巧被视为末技,历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西方格致学及其所产生的各种技术在传入中国之初就这样被悬置起来,这种悬置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仍然被坚持。^②守旧人士仍然认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③在强烈贬斥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他们仍然强调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根本之道,不可改变。

但是鸦片战争引起的震动使一些人开始修正华夷之辨的固有看法。视域的扩展使中国人开始思考和接受一个至关重要的新观念。这个新观念承认,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明,那

① 蒂尔贡、李晟文:《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③ 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些过去被想象成荒蛮异邦、蕞尔夷狄的“万国”，不再是天朝大国的附属之国，而是与中国有着不同文明的国度。曾纪泽曾经指出：“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国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以势较之，如中国已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挹大耳。”^①这一承认表明中国社会在外国入侵的危机之下，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力量，开始正视世界的多元格局，同时抛弃了世界一统于中国之下的传统观念。

不过这种承认是一种被逼迫之下的承认，华夷之辨尽管承认了此夷非彼夷，承认在中国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文明，华夷之辨由“以华统夷”变为“华夷并列”，但是守旧派并未真正放弃中国文明处于强势地位的看法。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文明尽管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中国，但是实际上西方文明来源于中国，或者至少中国也有类似的文明成就，此即所谓的“西学中源”说。钟天纬即认为：“举凡西人今日之绝技，莫非中国往哲之遗传”，“溯其本源，实事事胚胎于中土。或变其名目，或加以变通，中国为其创而西人为其因；中国开其端而西人竟其绪。”^②“西学中源”说将华夷之辨进一步由“华夷并列”转变为“夷从华出”，是在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同中国相比较显得更为强大这一事实的背景之下，传统华夷之辨的一种自我回护。这种自我回护尽管仍然固执于中国传统的正统性地位和先进性特点，但是实际上更多的则呈现出传统华夷之辨的步步退守、濒临崩溃的趋势。

“尊王攘夷”的救亡策略在华夷之辨的不断退守中渐渐失色，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危机的日渐加重，“尊王攘夷”的救亡策略却并未显示出实际的成效，这两个方面都显示出“尊王攘夷”的救亡策略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尊王攘夷”的策略只注重外国入侵这一方面的事实，并单纯地从这一事实出发寻求解决危机的道路，而忽视或者故意无视中国王朝衰落本身这一事实，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仍然简

①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7 页。同时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82—586 页。

② 钟天纬：《别足集·内篇·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光绪二十七年刻本。